

文化关注

“运城精神”的文化表达

□杜刚辰

新年伊始,运城市委宣传部推出“运城精神”——“崇文、厚德、敬业、拓新”,成为响当当的一枚鲜红印章,钤印在河东大地上。这是近年来,运城宣传文化部门积极探索挖掘遴选的文化结晶。前半句“崇文、厚德”是诗意的文化表达,后半句“敬业、拓新”是务实的践行表达。将“崇文”放在首位,当之无愧,恰如其分,充分体现了河东文化独特的这一面,有其唯一性、代表性、特质性。

(一)

中华文化源远流长,在浩如烟海的历史文化长河中,书写下波澜壮阔、如诗如画的历史篇章,构成了中华文明的基本脉络。河东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,与中华文化相辅相成,融会贯通,彼此呼应。河东文化名人灿如星河,曾经照亮过中国文化的星空。今发布的“运城精神”,让我们更多地了解了河东文化,领略其精神特质,比较全面地解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涵,成为新时代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实践、运城方案、河东特色。

在新的时代,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,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,面对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,我们要坚定文化自信,秉持开放包容,坚持守正创新,着力赓续中华文脉、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。河东五千年文明发展史,正是为中国文化自信的奠基工程,由此,河东地域文化有其独特的地方特色,鲜明的地域文化内涵。

“运城精神”的推出,对于运城文化的传承弘扬是一个良好的契机,也是一个良好的引领与塑造。

纵观各个历史时期,河东都是一个崇尚文化的地域。据《山西通志》《平遥府志》《蒲州府志》及各县志等史料记载,截至光绪年间,运城地区自宋代以来共建有书院70余所。其中包括,宋代

1所,建于宣和七年(1125)的夏县温公书院;金代1所,建于大定元年(1161)的绛县涑阳书院;元代4所,建于至顺四年(1338)的闻喜董泽书院、至正三年(1343)的永济首阳书院、解州裕斋书院和新绛河汾书院;明代11所,主要集中于弘治、正德、嘉靖三个时期;清代39所;始建年代不详者6所等。

清代是运城地区书院的繁荣时期。在70余所书院中,清代创建、重建、扩建的有50余所,占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。明清时期,运城地区书院的建立不仅仅是在州县所在地,也普及到了一些乡村,由此反映出运城地区在明清时期教育的普及程度。从碑记史料中,也可见曾经的辉煌。

书院的分布反映了运城地域的文化繁荣程度。我市书院比较集中的是永济、新绛、芮城、安邑等文化底蕴比较深厚的地域。作为书院“支流”的义学,运城地域的数量也很大。据张捷夫《清代山西书院考略》统计,河东地区共有义学189所,占到全省义学总数385所的49%。义学一般设立于乡村,主要教育无力到城邑就学的农村生童,可见当时河东农村教育的普及程度。而70余所书院除少部分位于乡村外,大多分布在各县城。农村的义学和城乡的书院,培养了大量文化人才,反映出运城地域文化的发达与普及。

(二)

分析河东文化发达的起因,一方面经济条件,运城素有“粮棉之乡”的美誉,同时,池盐的生产和销售也带动了商业的发展,使运城成为山西省的经济重心和财赋的重要来源。经济的发展,进而促进了文化的繁荣。

另一方面,运城历史悠久,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,历来人文荟萃。明清时代,运城又是薛瑄理学研究的重镇,也有利于书院的创立与发展。清朝经康熙、雍正之后,国家空前统一,社会秩序稳定,人口和财富迅速增加,

国家达到兴盛时期。经济的繁荣,对“兴学育才”既提出了需要,也提供了物质条件。

从志书碑文研究得知,书院的发展运行维护,有一套行之有效、契合实际的制度。学田制的推行,就是专门保障正常的教学运行及师生费用的合理安排。安邑条山书院自乾隆十年(1745)重建,到光绪二十九年(1903),存续时间近160年。从四则碑文中得知,其中“膏火”(教学费用)都与不同时期的行政长官和乡绅努力的善举有关。由此,可以感受到他们对于一个地方文化振兴倾注的情感与用心。

再说文庙。文庙是尊崇孔儒的殿堂,通过祭祀,尊崇圣人而阐明其道,使君子小人有所瞻仰感化。运城文庙无统计数据,但据笔者所知,有名的就有解州文庙、万泉文庙、运城敬一亭文庙等。大成殿成为文庙标志性建筑,秉承儒家之道,集古圣先贤,教化万众。形制完整的还有献殿、泮池、牌楼、照壁等,教化国人上千年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河东的文庙还成为很多村镇的学校,继续履行着教学的功能。

运城文庙和各地孔庙一样,有重要的教育功能,不仅传授盐业知识,还培养盐务专业人才。其创建于元代,明代初期停办了六七十年,后重新启用,清代继续使用,直到民国时期。在数百年中,其用“明伦善俗之教、大中至正之学、忠信仁义之理”等儒家思想,教育官吏、盐商及周边民众、子弟,为盐运司官吏、盐商、盐民及周边居民子弟入学和参加科举考试提供了机会,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。有学者不完全统计,明代培养进士24名,清代培养进士33名。正如《河东盐法备览》所称:“运学之设,师道立而教化行,理义明而风俗美,科第蝉联,人物彪炳。”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运城文庙先后被运城师范和运城中学择为校址。这两所学校,沐浴在文庙及“宏运书院”深厚的文脉之中,为政界、军界、艺术界、经济界等领域培养了大批优秀人

才。例如,外交家、首任驻美国大使柴泽民;国务院原副秘书长郑思远;原成都军区政委、上将张志坚;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崔光祖;全国著名画家邵仲节;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总部某部原副部长戴清民少将,都是运城师范或运城中学的毕业生。运城师范还为中小学培养了数以万计的优秀教师。而运城中学也为清华、北大等全国高等院校输送了一批批学生。

(三)

20世纪80年代,随着招生制度改革,河东一大批青年才俊走出河东,在外求学成才,成为改革开放40年的主力军。河东语言,成为省城高校的大语种。河东人崇文厚德,农家门额上都刻的是“耕读传家”“诗礼传家”“学绍薪传”“还读我书”“诗书执礼”“庭趋诗礼”等,都是崇尚文化,祈愿家风崇文,文脉相传。笔者的一个外地朋友,曾行走在河东的村庄,感叹河东文化的深厚,惊叹乡村民居门楼的典雅,更感叹河东人在他乡的影响。

散见于河东乡间的魁星楼、文昌阁与焚经塔,也是广大人民群众长期崇拜、敬畏文化的见证,他们希望村庄文脉赓续,子孙后代崇文识礼。有文字的纸张不能乱丢乱扔,像纪念先祖一样在焚经塔里焚烧,化作缕缕青烟,连绵人文,护佑子孙后代文运昌盛,希望家族兴旺发达。

想起小时候,乡村的学校各方面条件较差,老师会到学生家里轮流吃派饭,或者学生提上提盒把饭菜送到学校。那时的生活太过清苦,家长接到派饭牌,总要想办法借白面、割豆腐、炒鸡蛋、生豆芽,倾其所有为先生做上一顿可口的饭菜。这种尊师重教的表现深入人心,令人回味。

这些文化的表达,正是河东这片地域崇文精神的历史文化见证,愿在新的时代更加发扬光大,由文化自信成为文化自觉,由运城方案成为运城实践。

文化动态

运城籍画家令狐伟鹏作品展在京举行

运城晚报讯(记者 赵腾)借得山水生灵气,书画之苑竞芳菲。1月13日~17日,运城籍画家令狐伟鹏书画作品展在人美美术馆举行,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《令狐伟鹏书画作品集》同期首发。

此次展览以“师古开新、崇真唯美”为主题,汇聚了令狐伟鹏内容丰富、画风高古的书画精品。

开幕式上,人民美术出版社副总编辑王远,中国楹联协会会长助理、三顾堂书院院长顾仕魁等嘉宾先后致辞。令狐伟鹏将其代表作品《壶口雄风图》捐赠给人美美术馆收藏,北京人美艺术展览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朝生向其颁发“收藏证书”。

令狐伟鹏,运城人,笔名龙华,是人民美术出版社的签约艺术家,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中国画系,师承黄土画派创始人刘文西。从事书画教育工作20余年来,他多次应邀讲学并举办展览,为书画人才的储备、群众艺术素养的提高及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,作出了积极贡献。

记者在电话采访中了解到,《壶口



▲展览现场

雄风》的创作灵感来自于令狐伟鹏的山西老乡。他初到北京时老乡对他的帮助很大,他很感激。一个人初到异乡,思乡之情油然而生,于是他便想着创作一幅母亲黄河的美术作品。他的这位老乡

是山西吉县人,于是他决定创作出波涛汹涌、展现中华民族气概的《壶口雄风》。他还介绍,此幅作品的点睛之笔在于“德”。当谈到为何在众多作品中选择将《壶口雄风》捐赠给人美美术馆时,他

表示,人美美术馆是中国优秀的美术传播机构,应该将最美的东西传给该馆,而这个最美的东西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“德”。能将这幅《壶口雄风》留在人美美术馆,也是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了自己的贡献。

展览期间,展厅内的书画作品相得益彰。令狐伟鹏创作的一批表现不同人物形象、颂扬劳动人民高尚情操的作品悉数亮相。《父老乡亲》《陕北老农》等人物画中,老人形象多用焦墨干皴皴纹,以淡墨表现结构,随后赋彩润之。衣服用线抑扬顿挫,以表现服装的质感和身体的大结构,其后淡色赋之。

《令狐伟鹏作品集》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,收录令狐伟鹏的书画作品共70幅,绘画题材涵盖山水、花鸟、人物。《仙山高士观云图》《峨眉山盛景图》《龙台山观瀑布》等山水画,笔法谨细清秀,水墨、浅绛融为一体,画面呈现多种风格,体现了他的独具匠心。《鸿福双杯梅香》《和平长寿团圆图》《贵寿多子图》《月下松鹤图》等花鸟画,既有文人高雅的格调,又融入了民间艺术的因素,雅俗共赏。